


农业产业化与 农村人际关系

郭新平◎著



农村的变化不仅是指农村经济发生的变化，农民观念及农村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影响了农民之间的人际交往，形成了人际关系的新格局。

 人 民 出 版 社

农业产业化与 农村人际关系

郭新平◎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段海宝 周文婷

封面设计：王欢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业产业化与农村人际关系 / 郭新平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7

ISBN 978-7-01-021018-6

I. ①农… II. ①郭… III. ①农业产业化-关系-农村-人际关系-研究-中国
IV. ①F321 ②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37293 号

农业产业化与农村人际关系

NONGYE CHANYEHUA YU NONGCUN RENJI GUANXI

郭新平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2

字数：310 千字

ISBN 978-7-01-021018-6 定价：6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2
一、社会发展的空间转向	2
二、农业产业化中乡村人际关系的变迁	8
第二节 样本的选择：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典型模式	19
一、合作社模式：乡村内部的资源集中	19
二、龙头企业模式：乡村内外的企业引领	21
三、产业园区模式：政府主导的多重混合	22
第三节 调查研究的组织与安排	24
一、前期准备阶段	24
二、研究实施阶段	26
第四节 构建新型乡村人际关系	27
一、发挥规则的基础性功能：对人情与理性的双重节制	28
二、实现人情与理性的结合：对传统与现代的积极调试	29
三、建立平等的参与与合作：对人格与资本的内在协调	31
第二章 农业产业化与农村人际关系的研究基础	33
第一节 相关研究与理论基础	33
一、农业产业化相关研究	33

二、农村人际关系相关研究·····	40
三、农业产业化与农村人际关系理论基础·····	54
第二节 我国不同时期经济形态的演变与农村人际关系·····	59
一、土地改革时期·····	60
二、人民公社时期·····	62
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	66
四、农业产业化时期·····	69
第三节 农村人际关系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75
一、生产方式变革·····	75
二、交换方式变迁·····	78
三、组织方式创新·····	79
四、资源配置优化·····	82
第四节 农业产业化与农村人际关系的关联性分析·····	83
一、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推动力·····	83
二、农业产业化是新型农村人际关系的构建基础·····	84
三、新型农村人际关系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85
第三章 山西省经济发展概况及农业产业化实施·····	86
第一节 我国及山西省经济发展概况·····	86
一、我国经济发展特点·····	86
二、山西省经济发展特点·····	88
第二节 山西省农业产业化发展概况·····	97
一、山西省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必然性·····	97
二、山西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特征·····	101
三、农业产业化发展带来农村社会的变化——以调研县为例·····	105
第三节 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典型模式·····	108
一、我国农业产业化的主要模式·····	108

二、山西省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	114
第四章 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模式下的新型农村人际关系·····	118
——基于对山西苹果之乡临猗县的调查	
第一节 农业产业化及农民专业合作社·····	119
一、农业产业化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关系·····	119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	120
第二节 临猗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124
一、临猗县发展农业的条件·····	124
二、临猗县农业发展状况·····	129
三、临猗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132
第三节 精英参与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的人际关系分析··	137
一、合作社精英参与过程中的人际关系分析·····	138
二、精英参与合作社发展对农民主体的影响·····	149
三、精英参与合作社发展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153
第四节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对农村人际关系的影响·····	156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与参与行为分析·····	156
二、空间维度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组织管理及外部关系处理··	161
第五章 龙头企业引领模式下的新型农村人际关系·····	168
——基于对山西红枣之乡临县的调查	
第一节 农业产业化及龙头企业·····	169
一、农业产业化与龙头企业的关系·····	169
二、龙头企业·····	170
第二节 临县及临县红枣产业·····	176
一、临县发展红枣产业的条件·····	176
二、临县红枣产业发展现状·····	178

三、临县红枣龙头企业发展现状·····	179
第三节 龙头企业发展带来农村社会的变化·····	181
一、打造农村主导产业·····	181
二、带动农民脱贫致富·····	182
三、提高农民组织程度·····	183
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184
五、改善农村环境状况·····	186
第四节 龙头企业对农村人际关系的影响分析·····	187
一、龙头企业发展过程中农村人际关系的变化·····	187
二、龙头企业内部与外部人际关系变化·····	193
三、农村人际关系对龙头企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影响·····	197
第六章 农业产业园区组织模式下的新型农村人际关系·····	201
——基于对山西农牧之乡山阴县的调查	
第一节 农业产业化及农业产业园区·····	202
一、农业产业化与农业产业园区的关系·····	202
二、农业产业园区·····	203
第二节 山阴县农业产业园区的发展·····	208
一、山阴县发展畜牧业的条件·····	208
二、山阴县畜牧业发展历史与特点·····	211
三、山阴县畜牧业的产业化发展及模式选择·····	219
四、山阴县产业园区发展模式获益分析·····	225
第三节 山阴县农业产业园区的股份制经营·····	227
一、股份制合作模式实行的必然性·····	227
二、股份制合作模式的实现·····	230
第四节 农业产业园区与农村人际关系的关联性分析·····	234
一、农业产业园区带动型产业化模式的运行机制·····	235

二、农业产业园区发展对农村人际关系的影响·····	238
三、农村人际关系变化对农业产业园区发展的影响·····	247
第七章 构建农村新型人际关系的理性思考·····	250
第一节 精英视角下的农村人际关系变迁·····	250
一、农村精英效应·····	251
二、农村精英与非精英的合作类型·····	255
三、农村精英与非精英的互动关系·····	258
四、农村精英与非精英的博弈·····	261
第二节 交换视角下的农村人际关系变迁·····	267
一、交换关系的变迁与农业产业化发展·····	268
二、从交换的二元对立看农村人际关系变迁·····	269
三、从交换的三个维度看农村人际关系变迁·····	274
第三节 异化视角下的农村人际关系变迁·····	276
一、劳动异化理论中的人文关怀·····	277
二、农村人际交往中的异化现象·····	277
第四节 交往与分工视角下的农村人际关系变迁·····	279
一、交往与分工的内在联系·····	280
二、交往与分工理论在构建新型农村人际关系中的价值体现·····	281
第八章 构建新型农村人际关系的政策思考·····	283
第一节 新型农村人际关系构建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284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84
二、农业产业化对农村传统人际关系的重塑·····	288
三、农村人际关系差异化的表现·····	293
第二节 构建新型农村人际关系的基本途径·····	297
一、加强经济建设，为构建农村和谐人际关系奠定物质基础·····	298

二、加强文化建设，以特色文化调控农村人际关系·····	300
三、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构建农村和谐干群关系·····	309
四、加强保障体系建设，为构建农村和谐人际关系 提供制度依靠·····	313
结 语·····	322
参考文献·····	324
后 记·····	340

第一章 导 论

农业稳则天下安，农业兴促百业兴，农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对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经济的发展进步具有不可动摇的作用，因此，解决好“三农”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近年农业发展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用工业化理念谋划农业，以发展现代化农业为方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农民增收为核心，推动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特色化经营，从而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总体思路。^①同时，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严格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二十字总要求中，产业兴旺是首要和重点。产业兴旺离不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和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支撑，因此，在现阶段农村发展过程中要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延伸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并逐步建立起现代农业生产、经营和产业体系。在此意义上，农业产业化是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的必由之路，是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和农村美的重要举措，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所在。

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农业产业化主要有合作社、龙头企业和产业园区等

^① 参见何翔凤：《以县域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民增收》，《中国乡村发现》2013年第3期。

^② 新华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授权发布），2018年2月4日，见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2/04/c_1122366449.htm。

三种典型模式，在当前乡村社会具体表现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业产业园区等三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农业产业化的具体实现方式和组织形式，这三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虽是基于不同因素和力量而组织成立的，但都在实现乡村经济发展进步与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使市场经济中的理性、契约、规则、制度、利益等不断嵌入和影响乡村社会，乡村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发展的视野不再局限于城市的现代化，不再是片面追求城市数量和规模、城市人数增长以及城市经济发展指数等，而是在现代化推动社会资源总量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将乡村纳入社会现代化发展视野中，使乡村成为新的资源汇集之处，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成为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本书立足于乡村在新时代重新定位的大背景，基于乡村振兴根本在“保留”乡村的前提，将农业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通过农业产业化首先实现乡村的产业兴旺，并在此过程中更加注重人的整体性发展向度，进而从抽象和现实层面分析阐述农业产业化过程中乡村人际关系的变迁，寻求构建新型乡村人际关系的突破口和关键点。

一、社会发展的空间转向

（一）从片面到全面：社会发展视野中乡村的浮现

在我国前现代化和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跨度内，乡村地区在社会发展和

国家资源调控体系中处于资源供给状态。前现代化时期的王朝国家依托于纵向贯穿的官僚体制与横向铺陈的里甲制度，构建起国家的资源调控体系，这一调控体系的特征是正式与非正式力量的有机结合。作为国家在地方的正式代表，官僚力量存在于县所处的城市之中，而向乡村地区的行政延伸及从乡村汲取资源则依靠以衙役、士绅为代表的非正式地方力量。“中央官僚统治权力从未真正能直接深入到广阔的基层社会，在传统乡村便形成了所谓‘王权止于县’的治理格局。”^①同时，“中国历史上，农民的利益一般都通过乡绅向国家反映并得以表达，反过来乡绅又构成了农村的治理因素。”^②因此，国家从乡村地区提取资源的数量取决于中央与地方、官僚与士绅之间的博弈与妥协，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地区的资源更多流向地方精英的掌控之中，这就滞涩了传统国家积累资源的能力。随着现代化的逐渐开启，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的官僚体制突破县一级城市的边界，自上而下建立起基于国家制度理性的公社制组织架构，形成了新的具有超强汲取能力的国家资源调控体系。公社制在乡村的建立，一方面消解了士绅地主所代表的地方力量，改变了传统的乡村权力结构；另一方面在有限资源约束的情形下，适应了国家主导型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源积累规模的扩张趋势，国家将这一体系在乡村地区征集的农业剩余集中投向城市和重工业领域。“优先发展城市”、“以农补工”等政策和制度安排长期将乡村放在城市的从属位置上，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也让农业发展举步维艰，更极大地限制了乡村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开启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市场理性模式，社会资源总量及可供国家支配的资源数量相应增长，从而使国家资源调控体系能够有步骤地将乡村纳入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乡村地区逐渐进入社会发展的视野。在市场配

① 丁国胜、王伟强：《现代国家建构视野下乡村建设变迁特征考察》，《城市发展研究》2014年第10期。

② 吴思红、贺雪峰：《论国家与农村社会互动的具体处境》，《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置之外，由国家控制的资源在城乡之间的二次配置意味着乡村进入补偿性发展时期，乡村在国家资源调控体系中的供给定位也发生历史性的改变，国家逐步加大对乡村社会发展的关注和支持力度。也就是说，由现代化推动的社会资源总量的增长使国家的资源投放空间可以逐渐扩展到乡村，乡村在国家的资源调控体系中成为新的资源汇集之处，这种从片面到全面的资源调控转向是现代化深入和社会发展进步的空间表征。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的现代化真正被提上日程。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美丽乡村”。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新农村建设再到美丽乡村建设，乡村社会发展及现代化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头等问题。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进一步关注和重视乡村地区的发展：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面分析“三农”工作的新形势，研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政策；2018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详细描绘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宏伟蓝图；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2018年重点任务之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and 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的重要行动，是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作出的重大决策，为新时代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彰显了党和国家将实现乡村社会发展进步摆在重要位置的坚定决心。在此意义上，乡村地区已经逐渐摆脱了资源供给的历史定位，成为社会发展和现代化推进的关键所在，是新的资源汇集处和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二）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城镇化与农业产业化

作为衡量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城镇化长期以来都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并重点推进的一项重要战略。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截止到2016年年末，我国城市数量达到657个，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已经达到 57.4%，比 2012 年年末提高 4.8 个百分点。^① 但就目前状况来看，我国城镇化仍处于低水平阶段，难以突破粗放型发展模式，也依然未从根本上改善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严峻现状。而在土地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政策和制度缺位、决策力和执行力不足、基础设施不健全、各参与主体利益冲突等多方面原因，出现了城非城、村非村的尴尬局面。同时，在片面的现代化发展理论背景下，工业化和城市化被摆在了优先发展位置，国家以“取消”乡村来实现城镇化的单方面快速突进，这在带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促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城乡发展不均衡等问题逐渐凸显，城市加速扩张而乡村发展式微，乡村地区相较城市发展仍是滞后衰落，“村落终结论”、“农民终结论”等正在成为现实。鉴于此，为推动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和实现城乡均衡发展，中共中央于 2013 年制定并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明确提出要尊重市场主导，同时政府引导工作必须结合城镇化发展规律，实现因地制宜和创新发展。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难免存在为完成单纯的数据任务而忽视城镇化发展规律，出现只见“新型”和“城镇”而不见“传统”和“乡村”的片面发展状况，新型城镇化仍然任重而道远。

在总结以往城镇化单兵突进带来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的基础上，新型城镇化战略表现出了对乡村的全面关怀——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关注、对农业现代化的关注、对乡村发展的关注，这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和促进乡村经济社会进步等方面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进而为实现乡村振兴助力。但如前所述，新型城镇化战略从主客观方面依然难以摆脱“取消”乡村的内涵和外延限制，也就是说，新型城镇化实现现代化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依旧是以“乡村消失”为代价的，这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初衷是有所背离的。

毋庸置疑，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镇化率将

^① 参见李娣：《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与展望》，《中国经济分析与展望（2016—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8 页。

继续提高，但乡村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空间，仍会有大量农民在乡村地区生产和生活，“三农”问题仍是社会发展必须予以关注的重点。2018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城镇化进程中乡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党和国家立足于这一现实国情而提出的，也是对重视“三农”问题的最好回应和诠释。从发展方向上来看，乡村振兴战略是要在“保留”乡村的基础上，通过优先发展农业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与协调发展。但城乡一体化并非是将所有乡村城镇化，而是系统全面地统筹考虑城市与乡村的发展，使城市与乡村保持各自特色和独立性，乡村依然以农业为基础实现发展和现代化，城乡差别不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而是乡村振兴基础上的城乡互补。

在此意义上，农业产业化无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最佳路径，因为二者首先在“保留”乡村这一基本前提上是高度一致的。同时，乡村振兴战略将产业兴旺作为首要和重点，将农业农村发展放在突出位置，并致力于实现农业强的战略目标，而农业产业化是推动农业实现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和关键依托，是乡村现代化的重要经济基础。具体来看，农业产业化立足乡村发展现实，坚持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实行正规化和制度化管理，以市场和效益为导向，在实现效益的同时兼顾公平，注重社会化服务，并在乡村地区形成了合作社、龙头企业和产业园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生产组织形式，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乡村向现代乡村转变。再者，就农业产业化发展现状来看，其在促进现代农业建设和农民增收致富等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截止到2016年年末，全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达41.7万个，辐射带动农户1.27亿户，农户参与产业化经营年户均增收达3493元。^①农业产业化糅合了乡村经济发展、基层民主治理、传统乡土文化、美丽乡村建设等多个层面的因素，囊括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五个方面的战略目标，必然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内生性和系统性动力。

^① 参见《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促进乡村振兴——农业部副部长叶贞琴解〈关于促进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的指导意见〉》，《甘肃农业》2018年第1期。

（三）乡村振兴中人的发展向度：原子化与整体性

无论社会发展何阶段和程度，对人的发展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一直都存在，人的发展问题始终是一个古老却又新颖的话题。马克思在其人的发展理论中曾指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人发展的最终目标，一个人的任务和责任就是全面发展自己的能力，包括体力和智力、个体和集体能力、社会力等。同时，马克思认为每个人都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中，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不可能脱离社会整体而以原子的形式独立存在，即人以劳动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从事生产和交换等活动，共同生活和相互交往，由此必然产生一定的关系和联系，进而形成人所特有的社会属性。^①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处在一定社会关系当中的人与他人、群体、组织乃至社会之间所形成的交往互动关系，势必会在作用于自身与他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同时，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进步与和谐稳定产生影响。鉴于此，虽然现代社会仍强调个体的独立性、独特性和个性发展，但这绝不是提倡个体从整体性的人际交往关系中抽离而朝着孤立封闭的原子化方向发展，因为即使是原子化的个体依然是嵌入在整体社会关系当中的，整体性依然是现代社会中人发展的基本和最终向度。

反观传统乡村社会，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法制以及利用地缘的接近性在生产和生活实际中仿照宗法制建立的亲密合作关系，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传统习俗和乡规等非正式规范影响和约束着属于这一地域范围的人们，诸如孤立、冷漠、蔑视等无形的惩罚性行为在传统互助乡村社会中是非常可怕的，这也导致了生活在相对固定空间的人们遵循规矩是源于对这种行为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他们总是竭力维护自身、家庭乃至家族在整个乡村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和形象”，避免被排斥和孤立于亲密合作关系之外，而作为个体是完全依附于有权威的个人、家庭、家族和乡村社会的，独立性被集体所消解。随着现代意义上乡村社会的出现，人们突破了基于血缘和地缘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